

重审康拉德《间谍》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但汉松

内容提要 康拉德的《间谍》被广泛视为最早的一部“9·11小说”，但它与新世纪反恐话语的关联并非那么简单。19世纪末，欧洲出现的无政府恐怖主义暴力有其复杂的历史语境，康拉德对无政府主义者及其“行动宣传”暴力的书写，不仅仅指向了无政府主义运动背后隐秘运作的人性之恶，而且代表了这位波兰外来者对英国及欧洲大陆当时反恐政治的矛盾态度。只有重返《间谍》这个反讽文本的历史构建现场，我们才能更准确把握那个时期的康拉德与新兴的全球帝国之间的暧昧关系，由此提炼并重申他20世纪初期的政治小说对于当代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间谍》 康拉德 无政府主义 反讽

DOI:10.16345/j.cnki.cn11-1562/i.2020.04.010

利维斯(F. R. Leavis)认为康拉德代表了英国文学“伟大的传统”，并将《间谍》归入“康拉德最成功的作品”。^①但事实上，这部小说在20世纪大众读者中并不声名显赫。真正让它一夜之间获得世界性声誉的，是发生在纽约的9·11恐怖袭击。当代读者在这部爱德华时期的政治小说中，后知后觉地发现了康拉德笔下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新世纪全球恐怖主义之间重大的相关性。9·11发生后不久，《石板》(Slate)杂志宣称《间谍》成为了“美国媒体谈论最多的三部文学作品之一”(另外两篇则是奥登非常应景的诗作《1939年9月1日》和《美术馆》)。^②《间谍》中的故事和纽约发生的一切似乎有着不可思议的平行关系：两者都是恐怖分子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象征性建筑(格林威治天文台和世贸中心)进行爆炸袭击。于是，原本鲜有问津的康拉德旧作被贴上了“9·11小说”的标签重印再版，并跻身

于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纽约时报》的书评人声称《间谍》“在后9·11时代成为了被狂热崇拜的经典小说”，认为它是“对恐怖主义最杰出的小说式研究”。^③甚至还有评论家据此认为，“康拉德是21世纪第一个伟大小说家。”^④

关于《间谍》和后9·11时代的关联度，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它们也基本代表了西方政治光谱的两极。美国右翼媒体在康拉德小说中看到的首先是被袭目标的无辜性。试问，在现代文明中还有什么比天文学和格林威治天文台更显得政治中立和无辜呢？既然连这样的地方都能成为恐怖分子憎恨的对象，那么世贸中心——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本初子午线”——成为袭击目标也就在所难免了。美国保守主义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在9·11第二天发表社论，将康拉德笔下无政府主义者针对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的阴谋与古代野蛮人洗劫罗马神庙相提并论，并进

而推断美国的“国家中心和图腾”之所以“激起了那些人的恐惧和愤怒”，只是单纯因为美国“强大、富裕和美好”。^⑤对于左翼的批评家而言，康拉德的当下意义不在于刻画了早期恐怖分子的行动逻辑或组织方式，而是对主流9·11叙事的意义解构乃至消解。彼得·马洛斯(Peter Mallios)认为，“今日的新闻媒体将康拉德视为先知”，乃因为康拉德和鲍德里亚一样，将恐怖袭击事件视为一种高度媒介化的景观。^⑥此类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往往并不看重恐怖袭击的物质性，而是一再强调恐惧政治如何被现代媒介与恐怖分子合谋建构出来。

不难看出，当代读者在主张《间谍》的当代性时，往往带有先入为主的政治立场和议题，他们将康拉德百年前的小说映射到当下的情境，使之符合自己的期待视域。然而，康拉德和他当时的世界并非只是话语构建出来的，他笔下的无政府主义者及背后的国际政治角力有着显著的物质性，并深深根植于19世纪下半叶复杂的西方历史语境。笔者认为，在21世纪以“康拉德热”为名去重读其政治小说，尤其需要回溯作家与文本的历史性。只有深入认识其文学生产的社会机制，只有超越故事情节和文学形象的简单比附，我们才能准确地解析出《间谍》对今日的后9·11世界的警世之言。

—

从作家的文学生涯来看，《间谍》是他野心勃勃的转型之作。1906年以前，康拉德给英国读者的印象主要是一位海洋作家，目光总是投向帝国的远方。他之前的大多数作品要么关于航海的历险，要么关于欧洲海外殖民地的传奇。在1906年的一封信中，康拉德曾抱怨说“批评家总是急着对我进行审查……在一致夸赞的背后，我能听到有人低语‘继续写大海吧！别到陆地上来！’他们想把我贬谪到

海洋的中心。”^⑦康拉德显然无意听从这样的批评期待。在《间谍》中，读者将不再读到大海的波涛和异国情调的海岸线，而是看到伦敦雾霾下三教九流的栖居者，看到小说家更具实验性的视角拼贴和非线性叙事。在向友人解释《间谍》的创作初衷时，康拉德多次提到“风格”问题，并这样解释自己技术层面的意图：“(这部小说)对我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体裁的一次改变创新，也是努力在对情节剧主题做反讽式处理。”^⑧康拉德对他的首部欧洲城市小说倾注了极大心血，并向出版商打包票说该书会“引起轰动”，成为兼顾文学性和商业性的成功之作。^⑨

然而，《间谍》问世后并未给小说家带来期待的荣光，反而遭到了市场和评论界的双重冷落，出版后七年间，该书只卖出了三千多册。尽管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让无政府主义者再次站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也略微促进了《间谍》的销量，但整体而论这本书在康拉德在世期间销售惨淡。这次商业上的失败对当时经济拮据的康拉德是极为沉重的打击，他认为小说销量的低迷是对其职业作家生涯的巨大否定，这一时期他在给高尔斯华绥的信中，时常流露出生活日益陷入窘境的绝望感。更令康拉德沮丧的，是评论家对这次转型之作的冷淡评价。很多当时的书评人要么对小说中描写的伦敦阴暗面感到无法接受，要么认为作家刻画的人物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政治思想，而叙事时间和视角的倒错曲折又让普通读者云里雾里。^⑩虽然康拉德一直受到英国严肃评论界的青睐，但包括亨利·詹姆斯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这部城市题材的作品“更适合专业评论家品读，而非街头普通人”。^⑪

康拉德这部政治小说在出版和批评接受上的受挫，构成了我们重读《间谍》的重要历史语境，而该书的“作者序”又是本次重读的关键入口。这篇序言写于1920年，即《间谍》正式出版13年之后。此时的康拉德早已

今非昔比，他不再为图书市场而忧心忡忡，《机缘》(Chance, 1913)成为了他文学生涯的首部畅销书，确保了全家此后在英国社会稳固的经济地位。1920年《间谍》被改编为戏剧上演，这为名利双收的康拉德回顾旧作提供了契机。这篇迟到的“作者序”既是为《间谍》当年所受的冷遇做一番辩护，也是要和孕育这部作品的特殊时代进行一次对话。作家追忆过往，将1906年创作《间谍》的那段日子描述为“思想和情感受到触动的时期”。¹²让他当时深受触动的，是这个“发生在肮脏环境里的不道德故事”的素材来源。¹³据康拉德的自述，他当时处于文学创作转型的痛苦时刻，刚巧从“一个朋友偶然的交谈中”听闻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事情，于是开始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¹⁴这位被隐去姓名的朋友，就是他的密友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所有康拉德学者对此均无异议。两人在交谈中谈及了1894年闹得满城风雨的“格林威治天文台爆炸案”，康拉德将之描述为“如此荒谬绝伦的血腥事件，以至于人们无法用任何理性或非理性的方法来思考此事的缘由”。¹⁵然后，福特以“那种特有的随意、无所不知的口吻”说：“啊，那家伙是个傻子。后来他姐姐自杀了。”¹⁶康拉德告诉读者，那天聊起的天文台爆炸案的旧事，加上福特透露的内幕，成为了他写作《间谍》的故事核心。

康拉德去世后，福特却指出了“作者序”的失实之处。他承认当年的确讲了前半段话，但“温妮自杀”的结尾完全是康拉德编造的。¹⁷康拉德还在“作者序”中说，提供信息的这个朋友手眼通天，和伦敦三教九流都有交往，但转而又强调“我相信他跟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什么瓜葛，顶多见过他们的背影，这算是他跟那个秘密团体的全部交集了。”¹⁸然而，福特再度揭穿了康拉德所言非实。他承认自己“认识古吉街无政府主义团体中的很多人，而且也认识很多监视他们的警察”，正是

通过这层关系他才“向康拉德提供了包括回忆录在内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资料”。¹⁹按照福特的说法，康拉德在1920年重版《间谍》时，特意当面告诉他“我在‘序’里没有过多暴露你……我是非常小心的。”²⁰

那么，为什么多年以后，康拉德仍对福特这个信源如此讳莫如深呢？福特认为，康拉德有意替友人掩盖当年和无政府主义者过从甚密的历史，是不希望影响当时已功成名就的福特。²¹然而，真相或许更加复杂。众所周知，福特与“拉斐尔前派兄弟会”血缘关系密切，他有两个早慧的表妹，分别叫海伦·罗塞蒂(Helen Rossetti)和奥利维亚·罗塞蒂(Olivia Rossetti)，她们十几岁时就创办了无政府主义报纸《火炬》(The Torch)，曾发表过克鲁泡特金和萧伯纳等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并刊登过大量激进的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政论，而福特的早期诗作也曾在这里变成了铅字。据福特回忆，《火炬》编辑部还是流亡伦敦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的秘密沙龙地点，也是伦敦警察厅高度关注的对象，常有英法俄的谍报人员渗透监视。²²根据诺曼·谢利(Norman Sherry)的考证，康拉德在1904年到1905年期间与福特一家交往甚密，并且海伦·罗塞蒂与康拉德见过两次面。²³简言之，康拉德在“作者序”中放了烟雾弹，并未如实揭示自己当年对于伦敦无政府主义秘密群体的了解程度。

对于以虚构和想象为业的小说家来说，在“作者序”中玩一些戏弄读者和批评家的障眼法并不稀奇，但问题的关键是动机何在？一方面，康拉德对自己了解的无政府主义群体内幕做模糊化处理，可以确保让信源提供者（如福特和罗塞蒂一家）不惹上麻烦，隔断读者将书中人物和现实生活对号入座的可能。另一方面，康拉德也在多年后得以通过“作者序”，再度申明《间谍》是小说家想象力的产物。如该书副标题所言，它只是一个从历史事件中脱胎而出的“简单故事”(a simple tale)。

然而,从更深的层次来分析,康拉德之所以要做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表态,或许是希望回应批评家及大众读者一直以来对他的政治小说的非难,即小说家丑化了在当时有着历史进步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从而暴露了这位波兰裔作家自身的政治保守主义。

康拉德的矛盾立场在于,他既希望人们认识到笔下的这些事或人并非毫无历史依据的丑化式想象,又试图强调自己的文学想象力是超越现实历史的——它关照的是更普适的主题,而非一时一地的政治运动或社会危机。康拉德似乎从一开始就预感到,他对这个题材的处理方式有引发误读的风险。1906年他在给出版商的信中坦承“对于这样的主题,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完全错误的印象。而且,此事必须处理成一个具有反讽企图的故事,但它又要有戏剧化的情节发展。”^②同年,他写信告诉已经读过《间谍》的高尔斯华绥“它仅仅是个故事而已。我无意于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政治思考——或者认真对待其哲学层面:即作为人类不满与幼稚天性的宣言。”^③然而,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人们很难不将它作为一种政治评论或时事讽喻。该书出版前曾在纽约的《李奇微周刊》(Ridgway's Weekly)连载,当时的编辑未经康拉德的许可,在海报上擅自加了一句宣传语“关于外交阴谋和无政府主义者变节的故事。”^④《李奇微周刊》之所以会刊载这个故事,很可能与该杂志老板尔曼·李奇微(Erman J. Ridgway)的保守主义政治倾向不无关系。彼时的美国刚刚走出“镀金年代”,无政府主义者在1901年刺杀美国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的枪声犹在耳边,而1886年的“干草市场暴动”(The Haymarket Riot)和其后对八位无政府主义者的审判也并未在记忆中远去。对美国读者来说,康拉德的故事契合了当时美国城市弥漫的针对移民(尤其是意大利移民)的红色恐慌。

选择无政府主义者恐怖袭击这样惊悚的时

代题材,却又不情愿让当时的读者对小说主题进行政治解读,这确实是康拉德创作动机上显得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势必事与愿违。如“作者序”结尾所言“最近的形势迫使我不得不剥除这个故事披着的文学外衣,多年以前我煞费苦心才给它做出这件怒嘲的外衣。”^⑤显然,康拉德无奈地发现《间谍》被极大地误读了,人们不仅质疑其小说手法,也对他笔下滑稽可笑、邪恶愚蠢的无政府主义者形象而忿忿不平。

二

那么,康拉德在当时到底是如何看待19世纪下半叶登上历史舞台的无政府主义者呢?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仍需回到历史语境中,而不是以当下流行的评价方式来看待无政府主义。正如理查德·索恩(Richard D. Sonn)所言,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学家必须是“打破刻板印象的解构者……必须在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中,为无政府主义找回它应有的位置”。^⑥长期以来,因为巴枯宁和马克思的那场著名论战,无政府主义只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注脚,无政府主义者往往被视为一群无可救药的、仇恨秩序的幻想家。按照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的说法,人们通常将“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恐怖主义”混为一谈,对“无政府主义者”最常见的两种定义是:(一)“相信人类自由的实现必须基于政府的消亡的人”;(二)“仅仅鼓吹混乱但又对被摧毁的秩序不提供替代物的人”。^⑦正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历史偏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无政府主义是“对整个人类的犯罪”,甚至连立场偏左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也将之定义为“可悲的闹剧”。^⑧

然而,对于普鲁东和巴枯宁等人来说,无政府主义绝不等于制造混乱,他们认为无政府

主义追求的是一种人与社会的关系，它并非体系化的抽象信仰，而是生活中的行动。该主义的希腊文词根“Anarchos”字面意思是“没有统治者”（without a ruler），因此无政府状态（anarchy）既可以被负面解读为“没有法治和政府的混乱无序”，也可以被积极地诠释为“无需统治者就可以维持秩序的无人统治状态”。^③克鲁泡特金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出发，提出以“互助”（mutual aid）来重建一种摆脱了生物决定性的社会性，以此来取代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所谓的“适者生存”式丛林竞争法则。^④换言之，克鲁泡特金认为，无政府状态的理想社会并非没有秩序，而是摆脱了“利维坦”这个国家怪兽所强力维护的秩序，通过人与人的友爱形成了公社共同体，实现了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不难想象，这样的理论在19世纪末以《互助论》（*Mutual Aid*）、《面包与自由》（*The Conquest of Bread*）、《告少年》（*An Appeal to the Young*）等慷慨激昂的文本形式流传时，无政府主义对当时的知识青年来说是颇具启迪性的进步话语。

《间谍》中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形象基本上颇为负面，体现了社会主流对这个群体的某些刻板印象。被称为“假释的使徒”的米凯利斯刚摆脱了多年的牢狱生活，他“大腹便便，脸面肿胀，肤色苍白而略显透明，仿佛15年来愤怒的社会公仆蓄意要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给他吃大量的增肥食物”。^⑤这位年迈臃肿的老一辈革命家在监狱里培养出了乐观主义精神，总是在无政府主义者沙龙里预言和畅想私有财产的末日将要到来。另一位同样老资格的是卡尔·云特，他形销骨立的身材正好和米凯利斯截然相反，“黯淡无光的眼睛里依稀可见一股阴险恶毒的表情”。此人又老又秃，性格暴躁激进，自称“恐怖分子”，“怀着更为阴险的目的，充当了一名傲慢无礼、居心险恶的煽动家，鼓动着隐蔽的邪恶势力干尽了坏

事”（47页，51页）。然而讽刺的是，这个“老恐怖分子”只是终日坐而论道罢了，他口口声声煽动暴力破坏，但自己“一生中从未对社会大厦动过一根手指”（51页）。除了这两位代表“第一国际”时期的老派无政府主义者之外，还有正当壮年的奥西彭，他是19世纪末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中坚，以前是医科大学的学生，现在则是革命小册子的撰稿人。同样，康拉德毫不留情地揶揄他丑陋的容貌：“他塌鼻梁，嘴往外突，简直跟黑人的嘴巴鼻梁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颧骨很高，一双杏眼没精打采的冷眼窥视着。”（48页）这些无政府主义革命者不仅形容猥琐，道德品行也颇为不堪。按照维罗克的冷眼旁观，这群人共同的缺陷就是“懒惰”（54页）。虽然言必称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和革命的灿烂前景，但他们都厌恶任何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云特由一个他拐骗来的老女人照料生活，米凯利斯寄居在有钱的英国女贵族家中，而奥西彭在危急时刻骗取了温妮的信任和金钱，直接导致了她最终自杀。

康拉德对伦敦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形象塑造，显然会让一些人深感冒犯，甚至连好友高尔斯华绥也私下提醒他要注意“处理方式”。^⑥事实上，当时克鲁泡特金与康拉德同处一城，这位俄国贵族流亡者在英格兰旅居30年，精通多国语言，知识渊博，文笔优雅，与英国当时诸多知识分子建立了深厚友谊，其公众形象可谓相当正面。欧文·豪（Irving Howe）在《政治与小说》（*Politics and the Novel*）中，对《间谍》中流露的保守主义有过更激烈的批判，他指出加入英国国籍后的康拉德对“那个美好时代的英国”、对“英国绅士的彬彬有礼与和谐优美的英国乡村”有着一种怀旧之情。^⑦以精神分析的视角观之，康拉德在政治上如此厌恶无政府状态、支持保守的英国等级秩序，可能体现了他这个“新英国人”内心深处的某种不安全感。同时，康拉德对他刻意

远离的波兰民族主义及复国运动带有愧疚感,而19世纪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很多方面互为镜像,这又导致小说家将对民族主义暴力的偏见,投射到无政府主义者身上。^③尽管豪并不反对小说家以虚构的方式讲述无政府主义者的故事,但是他认为康拉德的讲述方式侵犯了人们对这个群体的常识性历史认知。^④简言之,由于康拉德意识深处对任何破坏现有秩序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带有偏见,所以他无法公正客观地在《间谍》中呈现那个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者。

关于康拉德的保守主义,涉及到了作家如何看待革命暴力杀人的问题,历来在康拉德研究中备受关注,任何研究其政治小说的学者均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但也常常看法迥异。上世纪60年代之前,欧文·豪、莫夫(Gustav Morf)和海伊(Eloise Knapp Hay)等人都是从心理分析入手,推测康拉德与其波兰文化身份之间的冲突,将小说家成年后的保守立场解释为波兰独立运动对他童年的创伤记忆。然而,晚近的西方康拉德研究已经不再给作家贴上政治立场的标签。如弗莱希曼(Avrom Fleishman)在《康拉德的政见》中率先提出,“‘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这样的词并不能准确界定康拉德的政见”,因为他的小说是“复杂的政治想象的戏剧性表达,因此不能被归结为政治意识形态”。^⑤霍索恩(Jeremy Hawthorn)也批评了先前那种将某种连贯的政治哲学加诸于康拉德作品的做法,认为康拉德常常接受和表述自相矛盾的政治观点,这体现了作家的“消极接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⑥而阿姆斯特朗(Paul Armstrong)则进一步认为,康拉德常常在小说中故意向读者传达自相矛盾的政治观察,这种做法是一种叙述和阅读伦理的策略,因为“他希望暴露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和不足,让读者充分承担自身的责任去探究复杂问题”。^⑦

笔者尤其赞同阿姆斯特朗的观点。以当代

的眼光来评判康拉德在某个历史时期的政治表达,常常会让评论家陷入视野的盲区,甚或为“后见之明”而沾沾自喜。事实上,对即将到来的世界之大变局,生活在20世纪初的康拉德无法像后人那样做出整体性判断。正在生成的历史不断影响并改变着彼时的康拉德对英国民主、波兰独立、19世纪无政府主义等问题的看法,甚至连我们惯用的“保守主义”一词在那个时代也有着不尽相同的意义。不妨说,正是因为康拉德在动荡的时代遍历了行将崩塌的旧帝国主义秩序,他的政治立场必然只能动态地存在于一个发展的谱系中。仅仅用“保守主义”无法准确概括《间谍》中含混矛盾的政治表达。

三

笔者认为,解读康拉德政治小说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反讽”一词。康拉德曾多次提及这个词,将之视为小说风格的落脚点。譬如,在1907年致友人的信中,他说自己创作《间谍》时“完全没有恶意”,“没有讽刺革命党人的世界”,而是在“对情节剧主题做反讽式处理”。^⑧康拉德显然有意区别“讽刺”(satire)和“反讽”(irony),两者的区分对于现代文学批评来说殊为重要。讽刺是带有鲜明立场的一种文学贬损艺术,它的喜剧效果来自所嘲弄对象的愚蠢与邪恶,而反讽则是一种隐藏作者意图的复调艺术。或者依照瑞恰兹(I. A. Richards)的著名定义,反讽就是“把相反的、互补的冲动合在一起”,它构成了诗的本质,其精髓在于“实现矛盾的态度和评价的平衡”。^⑨在布斯(Wayne C. Booth)看来,还存在“稳定反讽”和“不稳定反讽”之分,前者隐含有作者确定的(但非贬损性的)态度,它有别于字面意义,而后者则毫无任何固定立场可言,意义停留在反讽造成的永恒不确定性中。^⑩

当然，反讽不仅仅是一种新批评眼中的修辞，它甚至还可以成为一种世界观和认知模式。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中，对所谓的“反讽主义者”(Ironist)作了如下定义：“反讽主义者正视他或她自己最核心的信念与欲望的偶然性，他们如此秉持历史主义与唯名论，以至于不相信在那些核心的信念与欲望的背后，还有一个超越时间与机缘的东西。”^④在罗蒂看来，“反讽的反面就是常识”，反讽主义者也就是常识的反对者，而且他们“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根本的属性，没有真实的本质”。^⑤当罗蒂将反讽的追随者归入历史主义者和唯名论者之列时，他实际上是在批评某些反讽主义者过于强调历史和社会对人的决定性。理解反讽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坐标则是德国浪漫主义，它比罗蒂讨论的后现代思想语境更适用于康拉德本人。在耶拿派的重要人物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看来，反讽非但不是在罗蒂那里需要节制使用的“唯名派”认识论策略，反而是完美思想的最高尺度。他这样写道“思想是抵达了反讽这个理想境界的概念，是绝对对立面的绝对综合，是两种矛盾思想具有自我创造力的持续交换。”^⑥不难想象，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以反讽作为最高美学纲领，唯有凭借反讽才能打破古典主义对文学创造的桎梏。在施莱格尔和他的追随者看来，反讽所制造的混乱和混沌绝不是一种需要克服的弊端：相反，反讽是艺术家的创造之源，是“对永恒的机敏和无限丰富的混沌的清晰意识”。^⑦从哲学维度上说，施莱格尔将“苏格拉底式反讽”奉为圭臬，即将一切事物视为“既戏谑，又严肃，既无保留的敞开，又深深的隐藏”，这种反讽“源自于一种绝对直觉化的和一种绝对有意识的哲学的结合”。^⑧康拉德在《间谍》中试图追求的，正是这种饱含不确定与互斥性的反讽艺术。这也是为什么他在“作者序”中说：“《间谍》是我的一部坦率真诚的作品。即使

它运用了反讽的手段来处理这类主题，但其纯粹的艺术目的经过了深思熟虑，我真诚地相信，只要采用这种反讽的手法，我就能够将想说的话以讥讽和悲悯同时表达出来。”^⑨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康拉德想同时表达的讥讽和悲悯究竟指向什么，我们首先应该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和无政府主义的实践者做一分为二的处理。或如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所言，这个群体中一半是克鲁泡特金这样热爱人类的乌托邦式思想者，另一半则是仇恨世界、滥用野蛮暴力的杀人犯或歹徒。^⑩因此，康拉德在信中对密友格雷厄姆称，他并未讽刺革命者的世界，因为他笔下那些不堪入目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是假货”。^⑪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康拉德与伦敦的无政府主义激进团体并无直接来往，但他的朋友圈中并不乏亲近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其中有些还相当著名。譬如与康拉德一直保持密切书信往来的康宁厄姆·格雷厄姆(Cunninghame Graham)，此人是苏格兰工党的创立者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奠基人，思想一直左倾，曾是首位在选举中进入英国议会的社会主义者。康拉德将《间谍》题献给他所崇拜的威尔斯(H. G. Wells)，而众所周知威尔斯不只是一位科幻小说家，他在1903年至1908年间曾和萧伯纳等人一起积极参与了英国社会主义组织“费边社”。

当然，青年时代的康拉德曾对欧洲新兴的共产国际运动发表过悲观看法“社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终结于凯撒主义……去体制化、土地改革、四海皆兄弟这些，不过是通往毁灭道路上的里程碑。”^⑫但是，弗莱希曼认为，随着康拉德与格雷厄姆等英国进步左翼人士的友谊不断加深，他已经改变了原来的观点，转而以更为成熟和欣赏的态度来看待格雷厄姆推动的政治事业，并在很多政治议题上和格雷厄姆有相同看法。^⑬1900年前后，当康拉德在伦敦的肯蒂什镇文学沙龙上结识了萧伯纳和威尔斯以

后,他对于两人积极传播的社会进步主张也有了相当程度的认同,而不再以一种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来看待历史的可能。^⑤事实上,步入中年的康拉德并非如福特所言,只是一个“贵族保皇党卫道士”。^⑥生于基辅的康拉德非常清楚,在俄罗斯帝国统治下发生的波兰人叛乱固然是民族主义者追求的解放事业,但乌克兰仅有百分之三的波兰裔人口,包括康拉德父亲在内的波兰贵族却占有这里绝大多数土地,他们过去的优渥生活是以乌克兰人作农奴为代价来维系的。^⑦康拉德之所以在英国刻意与波兰复国事业保持距离,或许也是因为这个被奴役的民族本身就是奴役者。日俄战争之后,他有感于沙皇帝国被亚洲小国击败,写下了著名的政论文章《专制与战争》(Autocracy and War),指出欧洲传统的君主制原则已告终结,被保留下来的君主制必须在此时吸纳新兴的民族主义思想,以确保人民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⑧

由此可见,随着欧洲旧的政治秩序在20世纪初不断瓦解,康拉德与当时具有革命色彩的意识形态之间并无绝对的抵牾。俄国1905年爆发的革命让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启动政治改革,颁布俄罗斯帝国基本法并成立国家杜马,康拉德对此激动不已,认为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俄国内部发生“理性进步”的可能性,而这一切在一年前他都认为是无法想象的。^⑨他怀疑的不再是威尔斯、格雷厄姆等人所描述的伟大蓝图本身,而是维多利亚时代那种过度乐观的理性主义。这种怀疑来自于这位《黑暗的心》的作者对于人性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在康拉德看来,任何主义再美好也没有用,它必须依靠人的具体实践才能走出书本、落地生根,而人类的秉性弱点决定了理想主义蓝图往往会在现实中变得荒腔走板。康拉德相信,在资本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拜金主义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实现,因为“所有政治体系都受困于人类的自私自利之网”,现实中具有友人格雷

厄姆这种纯洁本性的人毕竟少之又少。^⑩尽管康拉德将《间谍》题献给威尔斯,但他也知道自己崇敬的作家错误估计了人性的阴暗,而他小说中那些龌龊猥琐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无疑就是在向乐观的“威尔斯主义”提出冷峻的反驳。这种世界观的差异最终导致了他们友谊的终结,康拉德在1918年的一封信中记述了他与威尔斯最后一次争吵时所说的话:“威尔斯,我们之间的分歧是根本性的。你并不关心人类,但认为他们会变好。我热爱人类,却知道他们无可救药。”^⑪

如果说康拉德对于革命理论家描述的历史进步还有过谨慎的欣赏,那么他对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实际参与者则保留着更为无情的不信任。这里,欧文·豪再度质疑康拉德的这种“反讽式处理”,他相信康拉德将无政府主义者描述为“憎恨一切有组织劳动”的懒鬼只是出于远离现实的个人狭隘偏见,这让读者进而思考“康拉德的小说和现实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即使那些从未参与过该运动的人,也能看出康拉德的反讽写法显示了“令人惊讶的低俗”。^⑫

在此,笔者试图为康拉德的人物反讽问题提出三点辩护意见。第一,《间谍》作为一部小说,必然处于作品与作品的文学关系中。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期,英国曾涌现了一大批讲述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城市恐袭的大众文学作品,它们往往被笼统称为“炸弹小说”(Dynamite Novel)。此类作品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刻画常常是脸谱式的、滑稽化的,他们并非凶神恶煞的恶徒,而是暴露出各种幼稚缺陷、引人发笑的极端分子,这些人所从事的无政府-恐怖主义往往漏洞百出、组织混乱,从而让故事本身充满了喜剧效果,“无政府主义呈现给人们的与其说是强烈的冲击,倒不如讲是捧腹的笑料”。^⑬鉴于康拉德创作此书时所寄望的商业回报,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戏仿当时这类读者喜读的“炸弹小说”的惯常写法,

塑造带有诙谐喜感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果将这种人物塑造方式仅仅归咎于作家对这个地下群体的恶意偏见,显然忽视了当时康拉德所处的大众文学环境对作品的影响。

第二点辩护则是源自现实本身。米凯利斯、云特和奥西彭的人物形象果真低于生活吗?欧文·豪或许没想到,19世纪英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懒惰”恰恰来自这个群体内部的自我描述。据谢利的考证,20世纪初伦敦至少有两本“前无政府主义者”写的书均以“好逸恶劳”、“懒惰”、“强烈抵制劳动”等字眼来评价当年的同道中人。^③更有趣的是,这些书中提到了对无政府主义者群体的四种划分:(1)披着无政府主义外衣做其他勾当的罪犯或准罪犯;(2)警方密探;(3)为“行动宣传”辩护的人;(4)“完美之人”。^④康拉德笔下的奥西彭、维罗克、云特和米凯利斯显然对应了这四种人,他们都不是小说家故意抹黑的杜撰,而是根据康拉德的调研,有确切的现实生活原型。同时需要指出,康拉德的革命者原型往往还不止来自19世纪的伦敦无政府主义团体,他也将社会主义者和当年“芬尼亚运动”的一些激进分子杂糅融入到人物形象中。譬如带有圣徒光环的米凯利斯,谢利认为此人原型是1877年假释出狱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戴维特(Michael Davitt),此人在爱尔兰的影响仅次于巴奈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⑤

最后一点辩护来自作家的自述。康拉德将“教授”和另外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做了区分,他特别强调“教授”并不可鄙,是“无法被腐蚀的”极端分子。^⑥此人个子矮小,精通化学,专向同道中人提供自制的定时炸弹;他相貌丑陋,带着斯多葛主义者的淡泊。在康拉德的笔下,他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撒旦,因为此人思想单纯到极度禁欲的程度,拥有一股知识分子变革社会的狂热劲,毫无奥西彭之流的投机心理。他的虚荣感并不是来自世俗的权力或

地位,而是深信自己是一个“道德执法者”——为了实现心中的人类正义,就必须摧毁旧的社会秩序,为此必须采取集体或个人的暴力行动。在康拉德的价值体系中,虽然“教授”这种人是“极端类型的自大狂”,但“每个极端分子都是值得尊敬的”,他们至少远比那些混入革命团体钻营私利的“假货”要可敬。^⑦也正是基于这份敬意,康拉德才会在“作者序”里说“在写作过程中,有时我自己就像是一个极端革命者。”^⑧康拉德这番话的诚意还是相当明显的,他并未居高临下地审视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力逻辑,而是试图在创作中亲身代入到他们的世界中。

结 语

康拉德与19世纪末帝国政治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这种复杂关联,决定了《间谍》所采取的反讽背后隐藏着作者极为暧昧矛盾的立场。海伊也曾批评欧文·豪,认为他对康拉德的反讽理解过于简单,仿佛只有“热情或愤怒”两个选项;其实,康拉德反讽中对无政府主义者既有“饱含同情的亲密”,也有“冷酷的嘲讽和温柔的玩笑”。^⑨我们或许还是应该认同斯蒂芬·罗斯(Stephen Ross)的说法,即康拉德代表了一种“弱理想主义”(weak idealism)。^⑩康拉德的小说要揭示的,并不只是这些恐怖分子为什么会失败,同时也关乎现代性与帝国内在的症候和矛盾,正是在这些悲凉真相背后,我们看到了保持人性温度的必要性。康拉德在《间谍》中给当代社会留下了一笔意义重大却不易消化的文学-政治遗产。他的政治小说写作根植于20世纪转折时代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加之作者自身多元的文化身份冲突,常常使得小说家以看似矛盾的反讽,言说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们的国家敌人。当9·11发生时,美国一些知识分子曾惊呼“反讽的时代已经终结了”。^⑪而在笔者看来,《间

谍》作为一部经典“9·11小说”的特质，恰恰在于坚持了反讽的含混性。

注释:

- ① F. R. Leavis, *The Great Tradition: George Eliot, Henry James, Joseph Conrad* (New York: New York UP, 1963), p. 210.
- ② Judith Shulevitz, “Chasing after Conrad’s *Secret Agent*”, *Slate* (September 27, 2001).
- ③ Tom Reiss, “The True Classic of Terrorism”,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 2005).
- ④ John Gray, “The NS Essay: A Target for Destructive Ferocity”, *New Statesman* (April 29, 2002).
- ⑤ “At War: The First Great War of the 21st Century Began September 11”, *National Review* (September 12, 2001).
- ⑥ Peter Lancelot Mallios, “Reading *The Secret Agent* Now: The Press, the Police, the Premonition of Simulation”, in *Conrad in Twenty-First Century: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and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156.
- ⑦ Zdzislaw Najder, *Joseph Conrad: A Life* (Rochester, NY: Camden House, 2007), p. 371.
- ⑧ Joseph Conrad,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5), p. 205, p. 216.
- ⑨ Andrew Mayne, *MacMillan Master Guides: The Secret Agent by Joseph Conrad*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87), p. 84.
- ⑩ Andrew Mayne, *MacMillan Master Guides: The Secret Agent by Joseph Conrad*, p. 84.
- ⑪ Jocelyn Baines, *Joseph Conrad: A Critical Biography* (London: Penguin, 1971), 347页。更多关于康拉德“缺乏大众可读性”的早期评论,可参见 John G. Peters, *Joseph Conrad’s Critical Recep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3), 2-24页。
- ⑫ Joseph Conrad, “Author’s Note”, in *The Secret Agent*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53), p. 7.
- ⑬ Joseph Conrad, “Author’s Note”, p. 7.
- ⑭ Joseph Conrad, “Author’s Note”, p. 11.
- ⑮ Joseph Conrad, “Author’s Note”, p. 9.
- ⑯ Joseph Conrad, “Author’s Note”, p. 9.
- ⑰ Ford Madox Ford, *Joseph Conrad: A Personal Remembra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24), p. 246.
- ⑱ Joseph Conrad, “Author’s Note”, pp. 9-10.
- ⑲ Ford Madox Ford, *Joseph Conrad: A Personal Remembrance*,

p. 246.

- ⑳ Ford Madox Ford, *Joseph Conrad: A Personal Remembrance*, pp. 246-247.
- ㉑ Ford Madox Ford, *Joseph Conrad: A Personal Remembrance*, p. 247.
- ㉒ Norman Sherry, *Conrad’s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71), pp. 210-12.
- ㉓ Norman Sherry, *Conrad’s Western World*, p. 208, p. 213.
- ㉔ Joseph Conrad,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 p. 201.
- ㉕ Joseph Conrad,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 pp. 204-205.
- ㉖ 康拉德对此深感不满,认为这句导语曲解了他的作品意图。参见 Joseph Conrad,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 206-207页。
- ㉗ Joseph Conrad, “Author’s Note”, p. 13.
- ㉘ Richard D. Sonn, *Anarchis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2), p. xii.
- ㉙ George Woodcock, *Anarchism: A History of Libertarian Ideas and Movements*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2), p. 10.
- ㉚ Brian Morris, *Kropotkin: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Oakland, CA: PM Press, 2018), p. 21.
- ㉛ George Woodcock, *Anarchism: A History of Libertarian Ideas and Movements*, p. 10.
- ㉜ Brian Morris, *Kropotkin: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p. 25.
- ㉝ Joseph Conrad, *The Secret Agent*, p. 46。(后文凡是出自小说正文的引文,皆在文内括号中标明页码。)
- ㉞ Joseph Conrad,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 p. 204.
- ㉟ Irving Howe, *Politics and the Novel* (Greenwich, Conn.: Fawcett Publication, Inc., 1967), p. 82.
- ㊱ Irving Howe, *Politics and the Novel*, p. 86.
- ㊲ Irving Howe, *Politics and the Novel*, p. 102.
- ㊳ Avrom Fleishman, *Conrad’s Politics: Community and Anarchy in the Fiction of Joseph Conra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7), p. viii, p. ix.
- ㊴ Jeremy Hawthorn, *Joseph Conrad: Narrative Technique and Ideological Commitment* (London: E. Arnold, 1990).
- ㊵ Paul Armstrong, *Play and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The Social Uses of Modernist Form* (Ithaca: Cornell UP, 2005), p. 74.
- ㊶ Joseph Conrad,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 p. 205, p. 216.
- ㊷ 这两个文学术语的区别可参考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术语汇编》的相关词条。参见 “Irony”, in M. 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New York: Heinle & Heinle, 1999), 134-138页 “Satire”, 275-278页。

- ④③ Wayne C. Booth , *The Rhetoric of Iron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5) , pp. 3 – 9 , pp. 240 – 245.
- ④④ Richard Rorty , *Contingency , Irony and Solida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P , 1989) , p. xv.
- ④⑤ Richard Rorty , *Contingency , Irony and Solidarity* , p. 74.
- ④⑥ Friedrich Schlegel ,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91) , p. 33.
- ④⑦ Friedrich Schlegel ,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 p. 100.
- ④⑧ Friedrich Schlegel ,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 p. 13.
- ④⑨ Joseph Conrad , “Author’ s Note” , p. 12.
- ⑤⑩ Barbara W. Tuchman , *The Proud Tower: A Portrait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War , 1890 – 1914*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 1996) , p. 108.
- ⑤⑪ Joseph Conrad ,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 , p. 205 , p. 216.
- ⑤⑫ Joseph Conrad ,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 , p. 12.
- ⑤⑬ Avrom Fleishman , *Conrad’ s Politics: Community and Anarchy in the Fiction of Joseph Conrad* , p. 25.
- ⑤⑭ Avrom Fleishman , *Conrad’ s Politics* , p. 31.
- ⑤⑮ Ford Madox Ford , *Portraits from Lif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1937) , p. 65.
- ⑤⑯ Avrom Fleishman , *Conrad’ s Politics* , p. 4.
- ⑤⑰ Joseph Conrad , “Autocracy and War” , in *Notes o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 (New York: Doubleday , 1921) , p. 96.
- ⑤⑱ Eloise Knapp Hay , *The Political Novels of Joseph Conrad: A Critical Stu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2) , pp. 224 – 225.
- ⑤⑲ Avrom Fleishman , *Conrad’ s Politics* , p. 28.
- ⑥⑩ Rupert Hart Davis , *Hugh Walpole: A Bi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 1952) , 168 页。关于康拉德和威尔斯后来的决裂 , 可参见 Linda Dryden , *Joseph Conrad and H. G. Wells: The Fin – de – Siècle Literary Scene* (New York: Springer , 2015) , 109 – 122 页。
- ⑥⑪ Irving Howe , *Politics and the Novel* , pp. 100 – 101.
- ⑥⑫ 马娅·亚桑诺夫 《守候黎明: 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 金国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112 页。
- ⑥⑬ Norman Sherry , *Conrad’ s Western World* , pp. 250 – 251.
- ⑥⑭ W. C. Hart , *Confessions of an Anarchist* (New York: E. Grant Richards , 1906) , p. 8.
- ⑥⑮ Norman Sherry , *Conrad’ s Western World* , p. 260 , p. 265 , p. 269.
- ⑥⑯ Joseph Conrad ,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 , p. 216.
- ⑥⑰ Joseph Conrad ,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 , p. 216.
- ⑥⑱ Joseph Conrad , “Author’ s Note” , p. 12.
- ⑥⑲ Eloise Knapp Hay , *The Political Novels of Joseph Conrad* , p. 253.
- ⑦⑩ Stephen Ross , *Conrad and Empire* (Columbia ,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 2004) , p. 188.
- ⑦⑪ Roger Rosenblatt , “The Age of Irony Comes to an End” , *Time* (September 24 , 2001) .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段映虹

ness”.

Affection , Politeness and Custom: An Inquiry into Shaftesbury's View of "Taste"

He Chang

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s view of "taste" originated from his discussion of "natural affections", and shared a longstanding affinity with "the philosophy of politeness" that he proposed. Through soliloquies and dialogues, he argued, affections could be communicated, taste whetted, and customs gradually transformed with the emerging public spirit. Only by internalizing taste into customs, Shaftesbury insisted, can taste be thoroughly incorporated into a nation's culture as a way of life and unconsciously improve the moral sense of the society. Therefore, his view of taste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 form of cultural practice.

Epidemic Writing an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Mrs. Gaskell's Novel *Ruth*

FAN Lijuan

Taking the epidemic background as its setting, Mrs. Gaskell's novel *Ruth* describes the survival situation of a "fallen" female Ruth, illustrating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in a neighborhood community, as well as discussing the topic of morality. As the medium and mechanism of transmitting moral judgments, her epidemic writing and typhus narration objectively push forward the agenda of public health. In the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ization, with increasingly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flow of information, a community with close connections and co-existence among people has emerged, which promotes people's community awareness.

The Anarchists in Conrad's *The Secret Agent*: A Revisit

DAN Hansong

Today, Conrad's *The Secret Agent* has been widely invoked as the first "9/11 novel", but its parallel to the 21st-century counter-terrorism discourse is not unproblematic. The European anarchist terrorism surg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was embedded in its complicated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onrad's portrayal of these anarchists and its "propaganda of the deed" violence not only points to human evil stealthily operating behind the Anarchist movement, but also reveals this Polish-English writer's ambivalent attitude to the 19th-century counter-terrorism campaigns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Continen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only by returning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of *The Secret Agent* conceived as an ironic text can we more congenially detect Conrad's ambigu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emergent global Empire, and corroborate his political fiction's uncanny relevance to our age.

Multiple Voices and the Gramophone Images in *The Waste Land*

ZHAO Jing

In the notes to *The Waste Land*, T. S. Eliot stresses what Tiresias sees. Actually, as a blind man, Tiresias can only hear voices rather than see anything in the waste land. In addition, the original title of